

关系对集体制农户收入的影响

□ 黄英伟

内容提要 关系是主要的社会资本之一,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家庭收入。本文利用生产队统计资料,考察集体制农业中关系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与生产队“队长”关系越好的农户,在农活分配中越容易得到高工分农活,家庭劳动工分收入越高;相反地,与生产队“队长”关系差的农户,因得不到高工分农活,为了弥补工分收入的不足,转向对肥料工投入更多劳动,于是肥料工分收入较高;同时,与生产队“队长”关系好的农户受到的照顾更多,照顾工分较高。本文利用江苏省新沂市一个生产队 1971-1981 年间的微观数据证明上述结论,模型回归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从而说明“关系”的影响真实存在。

关键词 关系 集体制 农户收入 劳动工分 肥料工分

作者黄英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北京 100836)

DOI:10.14167/j.zjss.2018.05.002

一、引言

关系作为主要的社会资本,一直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通常认为,改革开放前在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农户间的收入是平等的,很少或不受其他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的是近乎福利式的按需分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研究发现人民公社时期农户的收入依旧会受到劳动以外的社会因素诸如“关系”等的影响,这就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

生产队“队长”(队长、副队长、会计等,以下统称“队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农户的劳动对象和劳动时间,从而决定农户的劳动收入。集体农业生产过程有非常复杂和种类繁多的程序,每一道程序都是一种农活,每种农活的劳累程度和工分数量不尽相同。重要的是,每种农活由谁承担是队长说了算,当时称作“农活分配”(张乐天,2005)。在这样的生产制度里,农户与队长的关系就显得较为重要,农户与队长关系好自然可以得

到一些照顾,如被分配一些工分高又相对清闲的农活,或者在实物分配时得到一些照顾(李怀印,2010;黄英伟等,2013)。结果是农户与队长关系越好,家庭收入就较高一些。诚然,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照顾是有限度的。上述现象在当时的城市国营工厂里也存在,华德(1996)指出工人对领导有很强的依附关系,工人必须与领导处好关系才能获得诸如晋升、分房等方面的福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工厂领导掌握着各种资源,这些资源正是工人需要的。

本文使用江苏省新沂市一个生产队 1971-1981 年的实地调研数据检验所做猜测:与生产队“队长”关系越好的农户,在农活分配中越容易得到高工分农活,家庭劳动工分收入越高。该生产队有 60 多户,在数据期内频繁调换队长,11 年间共调换 6 位队长,平均 1.8 年调换一位队长。每位队长都会有相对关系好和关系差的农户,在不同队长的任期内,受到照顾的农户不同,从而使本文考察“关系”与收入之间存在的关系成为可能。

本文将农户与队长的关系分为“好、中、差”三类,考察“关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与队长关系越好,家庭总工分收入越高。其影响渠道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能得到更多的高工分农活,表现为这些农户的家庭劳动工分收入较高,稳定性检验发现这些农户收入较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能力强。相反,那些与队长关系不好的农户因得不到高工分农活,只好将劳动转向受队长影响较小的肥料工分上,表现为这些农户的肥料工分收入较高,从而证明肥料工分收入较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能力差。第二,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能得到更多的照顾,表现为这些农户的照顾工分收入较高,同样,能得到照顾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成分好。总之,与队长的关系显著影响农户收入。

本文研究深化了对集体制农户行为、农户收入的研究,对理解集体制农业的运行提供帮助,同时拓展了关系研究的文献范围。本文的第二部分是研究背景和使用数据,第三部分是主要的计量结果、影响渠道和稳定性检验,最后是结论。

二、背景与数据

(一)集体制农业劳动过程

中国农村集体制农业实行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的劳动生产制度。社员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为:首先由生产队干部或社员代表对每位社员进行底分评定,其次由生产队干部对社员分配农活,然后社员参加农业生产付出劳动时间,最后生产队记分员根据社员劳动种类和劳动时间记录相应的工分数,社员依据工分到年底参加分配决算。

底分评定是进入劳动前的重要环节,决定社员的劳动收入(黄英伟、吴萍,2018)。第二个重要环节是农活分配。通常是生产队队长或生产领头人负责农活分配,如果队长不在或有其他情况,副队长担任此任务。被分配不同的农活意味着劳动的辛苦程度和劳动收入不同,此时队长发挥的空间较大。与队长关系好的社员往往被分配给相对较好的农活,“比如看果园,这是既清闲又有好处的活,而且常年都有工分可拿”。也有一些属于临时性的农活,“比如我们队有一块菜地,那是我们的副业,种些瓜果蔬菜,然后到集市上去卖,一般去三个人,队里的会计或队长,再加上两个社员代

表,一个负责赶车、一个负责称秤,这种事大家都想去,每天可以补助15个工分,或者还能在集市上吃一顿饭,但基本只能跟队长关系好的才能去。”^①当然,队长在分配农活时也不能表现太明显,采访中就有老社员反映:“比如给我分的活重、分少之类的,我就不听话、不好好干了,就起哄。”最后参加劳动生产,根据每位社员自己的劳动底分和所分配的农活和劳动时间,记相应的劳动工分。

总之,社员的劳动收入与生产队队长有一定的关系。

(二)队长与关系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江苏省新沂市合沟公社(原属于邳州市)王庄生产大队第2生产队(以下简称第2生产队)的档案资料,该档案资料由笔者实地调研时获取,目前由笔者本人保存。第2生产队的档案时间跨度为1971-1981年,有60多户,户均3.95人,耕地面积400多亩,以种植水稻小麦为主,也有少量副业(如养鱼)。^②

本文计量模型的重要解释变量是农户与生产队队长的“关系”。这里有两个名词需要解释,一个是生产队“队长”,另一个是“关系”。本文的生产队“队长”泛指对农活分配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队领导,包括队长、副队长、会计、民兵连长等,为了简化起见统称为“队长”。通常或者绝大多数农活分配由队长决定,在一些特殊时刻(例如队长出差)其他生产队干部也会对农活分配有影响,因此统称为“队长”有一定的根据。本文的“关系”是指生产队中农户与生产队“队长”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

1. 在集体制农业中,队长决定农活分配。第2生产队在1971-1981年间共有6位队长,每位队长平均任职1.8年,任职时间最长的是4年,任职时间最短的仅为3个月。本文认为任职时间超过半年,且任职阶段大部分在农业生产时段内才能计为队长的有效任职时间;同时,该队长必须对农业生产有责任心,不能不关心生产队的事。按照这个标准,第2生产队有4位队长和1位副队长符合条件,具体如表1所示,本文将使用这5位“队长”来计算“关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本文在计算时保留了1位副队长,即1971年的副队长王德修,因为该年的队长是从第4生产队调过来的,他既不是第2生产队的人,也不在第2生产队参加劳动分配,所以基本上不关心第2生

产队的劳动事务,当时在第2生产队实际管事的是副队长王德修,所以该年对农户有影响的是副队长。另外1974年有两任队长,一个任职9个月,一个任职3个月;任职3个月的队长王廷桢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小,本文将其忽略。

2. 在集体制农业中,与队长关系体现差序格局。确定农户与队长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尤为重要。农户与队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实地调研确定,通过访谈多位社员交叉确认。本文将农户与队长的关系分为三类:好、中、差。实地调研时,对被访者询问某年本队家庭成员表上的所有农户与该年在队长的关系。为了将社员回忆时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偏差降到最低,笔者访谈了10位60岁以上且表达较为清晰的老社员,分别让他们给农户与队长的关系做出判断,之后再根据10位老社员的判断,依据多数原则进行选取,如果社员判断有

7位以上都相同就直接确定关系,如果社员判断一致性低于7位,则要再与他们讨论确认,最后由笔者确定。交叉验证使结果更加可靠。

第2生产队农户与队长关系的远近,在11年里随着生产队队长的调换而发生较大变化,具体如表2所示。如1972-1973年的队长是张连荣,与其关系好的农户占全体农户的40%左右;但1974年的队长是王正才,与其关系好的农户仅占10.3%;1975-1978年的队长是老革命王正宽,与其关系好的农户又升到40%以上,1979-1981年的队长是王德中,与其关系好的农户又下降到13%左右。可见,随着队长的调换,农户与队长关系的亲疏远近随之变化,这也是中国乡村社会差序格局的重要体现(费孝通,2013)。

3. 在集体制农业中,关系影响农业收入。确定生产队队长的任期和农户与队长的关系之后,需

表1 各“队长”任期情况

编号	姓名	任职时期	任职长度	备注
1	王德修	1971	1年	队长王昌志是从4队调来的,基本上对2队的事儿不关心,实际管事人是副队长王德修,所以该年以王德修为主
2	张连荣	1972-1973	2年	
3	王正才	1974	9个月	王正才从该年1月份任职到9月份,后赌气不干,王廷桢接任
4	王廷桢	1974	3个月	王廷桢仅任职3个月
5	王正宽	1975-1978	4年	王正宽是老革命
6	王德中	1979-1981	3年	

表2 农户与队长关系的远近分布情况

年份	农户与队长关系						合计
	好		中		差		
	户数(户)	比例(%)	户数(户)	比例(%)	户数(户)	比例(%)	
1971	11	16.7	30	45.5	25	37.9	66
1972	28	41.2	15	22.1	25	36.8	68
1973	28	40.6	16	23.2	25	36.2	69
1974	7	10.3	30	44.1	31	45.6	68
1975	29	42.0	30	43.5	10	14.5	69
1976	27	40.3	30	44.8	10	14.9	67
1977	28	41.2	30	44.1	10	14.7	68
1978	25	37.3	32	47.8	10	14.9	67
1979	9	13.4	34	50.7	24	35.8	67
1980	9	13.2	35	51.5	24	35.3	68
1981	9	14.1	33	51.6	22	34.4	64
合计/平均	210	28.3	315	42.5	216	29.1	741

要将农户与队长的关系与农户该年所得工分进行匹配,从而得出关系与农户家庭收入数据库,再与农户家庭信息进行匹配,以得出完整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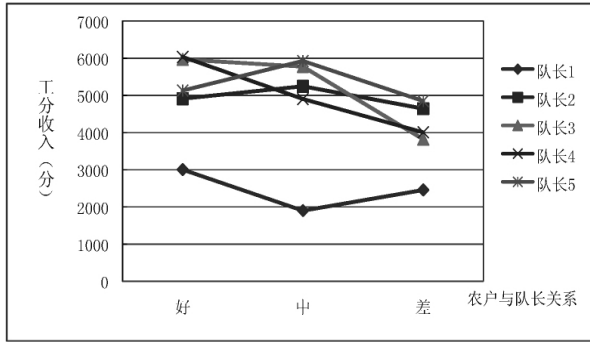


图 1 农户与队长关系及农户家庭收入

图 1 横轴表示农户与生产队队长的关系:好、中、差,纵轴表示农户家庭收入,用工分数表示。显然,农户与队长关系越好,家庭收入相对越高;农户与队长关系越差,家庭收入相对越低,在第 2 生产队五任队长的任期内,农户与队长的关系大体上表现出这种规律;当然,不排除异常情况。

(三)关系与收入

农户的家庭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劳动工分收入、肥料工分收入和照顾工分收入,通常劳动工分收入是其主要部分,约占家庭总收入的 80%以上。本案例中劳动工分收入均值为 4211.0,占总收入的比重是 84.7%;肥料工分收入均值为 472.8,占总收入的比重是 9.5%;照顾工分收入均值为 290.3,

占总收入的比重是 5.8%。1971-1981 年间农户与队长关系及农户各种工分收入情况如表 3 所示。

就农户与队长的关系而言,在劳动工分中,农户与队长关系由好到差,则农户劳动工分所得越来越少,该趋势较为明显。其中,农户与队长关系好,年平均获得劳动工分 4472;农户与队长关系中等,年平均获得劳动工分 4411;农户与队长关系差,年平均获得劳动工分仅 3670。在肥料工分中则出现与劳动工分相反的情况,即农户与队长关系越好反而肥料工分收入越低。其中,农户与队长关系好,年平均获得肥料工分 431;农户与队长关系中等,年平均获得肥料工分 507,远高于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肥料工分收入;农户与队长关系差,年平均获得肥料工分 464,也高于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肥料工分收入。在照顾工分收入中趋势更为明显,农户与队长关系好,年平均获得照顾工分 556;农户与队长关系中等,年平均获得照顾工分快速下降为 247;农户与队长关系差,年平均获得照顾工分仅 94。可见,关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较为明显。

(四)研究假说

基于上述背景介绍与数据说明,本文提出如下 3 种假说:

假说 1: 农户收入受到与队长关系的影响,与队长关系越好,农户收入越高,主要表现在劳动工分收入上。集体制时期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属于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的影响较大。生产队队长通过农活分配使其关系好的农户受益,称之为“关系效应”。

表 3 农户与队长关系及农户工分收入

关系	劳动工分收入			肥料工分收入			照顾工分收入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1971	2357	1601	2081	309	261	284	336	103	90
1972	3797	4087	3678	756	1007	895	374	279	26
1973	3881	4222	4162	456	465	465	557	434	57
1974	5385	4861	3206	458	558	381	121	353	232
1975	5548	4835	4294	420	447	369	619	93	0
1976	4919	3949	3552	375	398	266	500	79	0
1977	4372	4228	3658	299	401	208	552	80	0
1978	5493	5002	3571	376	507	284	700	88	0
1979	4865	6390	5265	395	671	582	683	474	42
1980	3560	4997	4141	380	722	591	1067	444	204
1981	3466	3759	3130	312	333	358	656	333	132
平均	4472	4411	3670	431	507	464	556	247	94

假说2: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收入高,主要表现在劳动工分收入上,其影响途径是队长的农活分配差异。与队长关系不好的农户因在劳动工分上不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就将劳动投入到受队长影响较弱的肥料工分上,也就是说,与队长关系越差的农户,其家庭肥料工分收入越高,称之为“替代效应”。

假说3:中国农村集体制的最大优势之一有良好的社会福利措施,使孤寡老人、军烈属、残疾人员能得到很好的保障。但在具体执行时不免有偏差,即被照顾人员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如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可能得到的照顾多一些。这并不是说当时的照顾全靠关系,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而且范围很小,因为有些被照顾户是客观存在的,如军烈属,不管谁是队长,他们都是军烈属。与队长关系越好受到的照顾可能越多,称之为“照顾效应”。

下面使用实地调研数据验证本文提出的3个研究假说。

三、计量结果

(一)关系对总收入的影响

首先考察集体制时期农户与生产队队长的关系对农户总收入的影响。采用OLS(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被解释变量是农户年家庭总工分收入,即以户为单位从集体获得的劳动报酬总和,也是农户当时的全部收入。家庭总工分直接以工分数表示,为了使结果更具可读性,本文未做对数化处理。

核心解释变量是农户与队长的关系,分为好、中、差三类。以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作为对照组,处理成虚拟变量放入计量模型。本文假设与队长关系越好的农户家庭收入可能越高,与队长关系越差的农户家庭收入可能越低。

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和家庭阶级成分。家庭人口是集体制时期家庭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糊口经济条件下,人口和劳动力数量是家庭收入的最直接影响因素。由于缺乏劳动力数据,故无法控制劳动供养因素(即家庭人口比家庭劳动人数)。家庭阶级成分是衡量家庭政治身份的变量,可能影响农户的劳动机会获得、农活分配等情况,因此会影响农户收入。第2生产队中地主占总农户的6.5%、中农占25.7%、贫农占64.7%,此外,知青占3.1%。家庭阶级成分的对照组是地主。

表4 关系与总工分收入的计量结果
(被解释变量:家庭总工分)

	(1)	(2)	(3)
与队长关系:中	-311.4 (286.9)	-496.4*** (173.3)	-505.8*** (175.5)
与队长关系:差	-1,236*** (311.1)	-775.2*** (188.3)	-843.8*** (196.7)
家庭人口		1,086*** (30.35)	1,094*** (31.82)
阶级成分:中农			-449.9 (325.1)
阶级成分:贫农			-458.8 (309.6)
阶级成分:知青			-411.2 (515.9)
Constant	5,456*** (221.5)	1,103*** (181.8)	1,526*** (338.3)
Observations	736	734	732
R-squared	0.023	0.646	0.646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从表4的计量结果来看,以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作为对照组,可以发现与队长关系中等和差的农户家庭总工分收入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也就是说,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相比,其他两组的家庭总工分收入明显偏低,而且随着关系越疏远,家庭总工分收入越少。就工分数来说,与队长关系中等的农户家庭总工分收入比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低505.8,与队长关系差的农户家庭总工分收入比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低843.8。此外,家庭人口与家庭总工分收入显著正相关,家庭每增加1人,工分总收入增加1094。阶级成分对家庭总工分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表4的计量结果证明了关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同时验证了假说1,即农户收入具有“关系效应”,但需要进一步解释关系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农户收入,进而有助于理解集体制农业的运作机理。

(二)影响渠道

集体制时期农户家庭收入由劳动工分、肥料工分(也称投肥工分)和照顾工分组成。前两者是农业劳动中的农活分配,后一种是集体制时期的社会福利。三种工分共同决定了农户的家庭收入,所以影响该时期农户家庭收入的渠道就体现在这

三种工分上。

本文需要证明劳动工分、肥料工分和照顾工分这三种工分收入均和农户与队长的关系有关。

1. 首先考察农户与队长关系对农户家庭劳动工分的影响。很明显,和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相比,与队长关系中等和差的农户家庭劳动工分均较低。关系与工分收入是负相关关系,且在与队长关系差的农户中较为显著,如表 5 所示。

表 5 关系与劳动工分的计量结果
(被解释变量:家庭劳动工分)

	(1)	(2)	(3)
与队长关系:中	-60.34 (266.6)	-217.1 (180.2)	-219.4 (182.4)
与队长关系:差	-801.4*** (289.1)	-401.8** (195.9)	-458.8** (204.5)
家庭人口		935.0*** (31.56)	949.5*** (33.08)
阶级成分:中农			-527.3 (337.9)
阶级成分:贫农			-525.2 (321.8)
阶级成分:知青			-159.4 (536.3)
Constant	4,472*** (205.9)	721.2*** (189.1)	1,165*** (351.7)
Observations	736	734	732
R-squared	0.014	0.552	0.554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家庭劳动工分的获得既与家庭成员的劳动程度相关也与获得的劳动种类即所分配到的农活相关(李怀印,2010)。换句话说,在当时所有农户都要努力挣工分的前提下,工分的种类决定了获得工分的数量,即农活分配的差异。例如普通农活大概一天 10 个工分,可有些农活的分值很高,高达 15 分或 20 分不等,还有些农活(例如养牛)不管天气情况如何每天都可以得到工分。农业靠天吃饭,天气不好就影响出工,进而影响工分所得。比较“好”的农活通常只有与队长关系好的社员才能获得,比如赶大车、拉化肥等农活既轻松工分又高。这就是关系影响劳动工分所得的渠道。

从表 5 的计量结果来看,与队长关系中等的农户家庭劳动工分所得比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低

219.4,但统计上并不显著,但与队长关系差的农户家庭劳动工分所得比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低 458.8,且统计上非常显著;这说明与队长关系越差越不容易得到高工分农活。

2. 在家庭肥料工分中,与队长关系差的农户肥料工分较多,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与队长关系差的农户工分收入低是因为得不到高工分的农活,为了弥补工分总数量的不足,只能将努力方向转到肥料工分,在肥料工上投入更多劳动。这就是关系影响肥料工分所得的渠道。本文的计量结果证明了这种推测,如表 6 所示。

表 6 关系与肥料工分的计量结果
(被解释变量:家庭肥料工分)

	(1)	(2)	(3)
与队长关系:中	76.15* (38.95)	59.95* (32.36)	58.62* (32.79)
与队长关系:差	32.66 (42.23)	78.18** (35.16)	78.10** (36.76)
家庭人口		103.7*** (5.665)	101.4*** (5.947)
阶级成分:中农			59.55 (60.66)
阶级成分:贫农			41.76 (57.78)
阶级成分:知青			-35.00 (96.29)
Constant	431.1*** (30.10)	13.84 (34.02)	-17.10 (63.19)
Observations	735	733	731
R-squared	0.005	0.318	0.319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从表 6 的计量结果来看,和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相比,与队长关系中等和关系差的农户家庭肥料工分收入均较高。具体而言,与队长关系中等的农户肥料工分收入比关系好的农户高 58.6,与队长关系差的农户肥料工分收入比关系好的农户高 78.1,且与队长关系越差肥料工分收入越高,在统计上均较显著。

从而,假说 2 得以验证,部分农户收入存在“替代效应”。

3. 最后一个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渠道是照顾工分。根据假说 3,与队长关系越好则被照顾的可

能性越大,表7的计量结果验证了该假说。

表7 关系与照顾工分的计量结果
(被解释变量:家庭照顾工分)

	(1)	(2)	(3)
与队长关系:中	-308.2*** (81.27)	-318.8*** (81.05)	-328.0*** (82.16)
与队长关系:差	-461.4*** (88.13)	-443.8*** (88.07)	-458.5*** (92.12)
家庭人口		47.37*** (14.19)	42.49*** (14.90)
阶级成分:中农			60.85 (152.2)
阶级成分:贫农			25.18 (145.0)
阶级成分:知青			-215.6 (241.5)
Constant	555.5*** (62.75)	368.1*** (85.03)	370.6** (158.4)
Observations	736	734	732
R-squared	0.038	0.053	0.055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从表7的计量结果来看,与队长关系越差的农户照顾工分数越少,且在统计上显著。和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相比,与队长关系中等的农户照顾工分数低328.0,与队长关系差的农户照顾工分数低458.5,差异显著。说明虽然当时主观影响较小,但根据不同关系对一些农户进行照顾的情况是存在的。当然也可能存在反向相关,或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将在下文进一步研究。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与生产队队长关系好的农户收入比其他农户高。但可能存在一个问题:与队长关系好的农户之所以收入高,不是因为与队长关系好,而是因为自家的劳动力多或劳动能力强。

为了消除这种影响,本文将所有农户分为劳动力多的农户和劳动力少的农户,由于没有确切的劳动力数据,作为替代,本文选择家庭人口小于等于2的为劳动力多家庭,家庭人口大于2的为劳动力少家庭,因为家庭人口越少越可能没有小孩,劳动力比例相对可能越高,相反家庭人口越多,劳动力比例相对可能越低。

研究发现,与全样本的计量结果几乎一致,无论在劳动力少的家庭还是在劳动力多的家庭,劳动工分、肥料工分与上文研究结论一致,即在劳动工分中,与队长的关系越好,劳动工分越多;在肥料工分中,与队长的关系越差,肥料工分越多,具体如表8中第(1)-(4)列的回归结果所示。

照顾工分可能存在一种偏差,即成分好的农户受照顾程度高,也就是说,这些农户之所以受到照顾不是因为与队长关系好,而是因为自己的成分好。为此,本文剔除地主和中农成分,仅选择贫农和知青即选择成分一致的农户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依旧是与队长的关系越好照顾工分越多,具体如表8中第(5)列的回归结果所示。

上述检验结果,证明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也说明关系的影响真实存在。

表8 稳健性检验

样本	劳动力少家庭		劳动力多家庭		贫农与知青
	(1)	(2)	(3)	(4)	(5)
被解释变量	家庭劳动工分	家庭肥料工分	家庭劳动工分	家庭肥料工分	照顾工分
与队长关系:中	-582.3***(160.5)	55.63(53.64)	40.74(258.2)	70.47*(41.79)	-264.4***(99.17)
与队长关系:差	-206.7(171.7)	51.76(57.38)	-550.5*(301.3)	96.45**(48.75)	-367.9*** (113.5)
家庭人口	1,418*** (130.5)	130.1*** (43.60)	997.1*** (58.18)	107.9*** (9.414)	47.56*** (17.95)
阶级成分:中农	-464.4** (211.0)	94.69(70.13)	-1,166(708.8)	-56.21(114.7)	
阶级成分:贫农	-149.0(190.7)	103.1(63.40)	-1,250*(690.9)	-89.86(111.8)	
阶级成分:知青	291.7(284.3)	1.606(94.61)			
Constant	346.8(305.1)	-81.36(102.1)	1,442*(767.0)	55.24(124.1)	314.9*** (102.4)
Observations	250	249	482	482	496
R-squared	0.406	0.070	0.386	0.221	0.037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四、结论

收入平等是发展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包括关系在内的社会资本对收入平等有一定的影响。在中国集体制农业时期,农户间的收入相对来说较为平等,但诸如关系等社会资本会对收入产生作用,这是以往研究集体制农业时未曾考虑的研究视角。基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了农户与生产队队长的关系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该研究对理解集体制农业内部的发展规律,农户间分化和劳动积极性等提供了帮助。

本文利用江苏省新沂市一个生产队1971-1981年间非常罕见的详实的历史数据,结合笔者长期实地调研访谈资料,证实关系对收入的影响。具体步骤为:首先确定生产队掌权者名单,然后确定所有农户与队长等实权人物关系的远近亲疏,最后将农户收入数据与关系数据进行匹配,从而得到可供分析的数据库,采用O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本文提出的3个研究假说。

实证研究发现,关系的确对农户收入有显著影响,与队长关系越好的农户收入越高,与队长关系越差的农户收入越低,且在研究时段1971-1981年间趋势一致。继续探究现象背后的影响机制,发现“关系效应”“替代效应”和“照顾效应”三种效应同时存在。“关系效应”说明,生产队队长在农活分配时存在偏差,对与其关系好的农户分配好的或工分高的农活,以便使他们获得高工分收入。“替代效应”说明,农户在不被队长偏向的情况下只能寻求增加收入的替代方案,于是他们将更多的劳动投入到队长影响较小的肥料工上,结果所得肥料工分收入较高。“照顾效应”说明,队长在选择被照顾农户时有一定的偏向,被照顾农户明显与队长关系更好,且所得照顾工分更高。最后,为了避免遗漏变量或逆向因果等问题,本文又考察了计量结果的稳健性。在考虑劳动力多少和家庭成分后,计量结果依然稳健,说明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集体制农业是中国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理解农村改革何以发生,以及集体农业的效率等问题,以便为今后的农业发展和合作组织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注释:

- ①资料来自作者的实地访谈,时间为2015年和2016年。
- ②关于集体制农业档案记录的具体内容可参见黄英伟(2012)。

参考文献:

1. Huang Y.W., Li J. and Gu Z. "Rural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in the People's Commune Period: the Case of Dongbeili Production Team in Shanxi Province"[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6, 8(4):595-612.
2. Li H.Y. "Everyday Strategies for Team Farming in Collective-Era China: Evidence from Qin Village"[J]. *China Journal*, 2005, 54(1):79-98.
3. Putterman L. "Effort, Productivity, and Incentives in a 1970s Chinese People's Commune"[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0, 14(1):88-104.
4. Putterman L.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Collective and Reform Eras in Perspectiv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美]华尔德著:《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 [美]李怀印:《乡村中国记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 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华书局2013年版。
8. 胡英泽:《人民公社时代农村档案与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9. 黄英伟、陈永伟、李军:《集体制时期的农户收入:生命周期的影响——以河北省北街2队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
10. 黄英伟、吴萍:《底分评定:人民公社时期底分影响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1. 黄英伟、张晋华:《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差异与农户收入:基于分层线性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
12. 黄英伟:《集体制时期农村经济档案论述——以江苏祖堂大队为例》,《古今农业》2012年第4期。
13. 辛逸:《“按需分配”的幻灭:大公社的分配制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4. 徐卫国、黄英伟:《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实物化及其影响——以20世纪70年代河北某生产队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5. 张江华:《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
16.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责任编辑 张华勇

ABSTRACTS

Analysis of Endogenous Social Dynamics in the Star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4)

Duan Zhiwen, Min Shuai

(*Marxism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Abstract: The start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late 1970s was initiated by strong endogenous social forces.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shown by the broad masses of people during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iananmen Incident, th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reflected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standard of truth and the reform consciousness shown in the practice of "contract production to the households" in rural areas, all of these demonstrate the formation of the folk-driving for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rty, the leadership power that persisted i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broke the bondage of the "Two Whatever", promoted the liberation of ideas in time, correctly grasped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and promoted concrete practice of bringing order out of chaos in various fields, all of these demonstrate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al upper-level driving forc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forces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and the unity of ideas, the historical resultant forc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was formed. The intrinsic social dynamics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have demonstrated the unique features of modern development of post-development China and also show the special charm of China's road and China's plan.

Key words: the start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social dynamics; endogenous features; historic transition

Guanxi and Peasant Household Income under Collectivization (15)

Huang Yingwei

(*Institute of Economic,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Abstract: Guanxi is one of the social capitals that affects family income. Using production team account book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guanxi to peasant household income under collectivization agriculture. The results provide that the family total work point income is higher with good guanxi with leader of brigade. The mechanism include: (1) the household which have good guanxi with leader of brigade get more agrarian work with higher work point and get higher work point income; (2) on the contrary, the household which have bad guanxi with leader of brigade put more labor time to fertilizer work point because they haven't the opportunity to get higher agrarian work point and get more fertilizer work point; (3) the household which have good guanxi with leader of brigade obtain more consideration. The data of production team of Xinyi (1971-1981) prove the result.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 is robust.

Key words: Guanxi; collectivization; peasant household income; labor work point; fertilizer work point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Internet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ke Hangzhou Comprehensive Test Area as An Example (23)

Xu Jiayang, Guo Fuchun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Hangzhou cannot do without financial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a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s a complex and systematic project.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Internet plus" background, cross-border e-commerce brings new demands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raditional finance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personalized need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test area in Hangzhou is an opportunity.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eco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l mechanism of Internet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specifically constructs the mechanism of Internet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Hangzhou. Finally, from the aspects of perfecting the third party cross border payment system, innovating the supply chain finance mode, developing the Internet consumption financial service and docking the Internet financial big dat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